

外语教育往事谈

——教授们的回忆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语教育往事谈

——教授们的回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语教育往事谈 / 季羨林等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2004重印)

ISBN 7-81009-157-3

I. 外… II. 季… III. 外语教学—中国—文集

IV. 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12346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王冬梅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03 千字

版 次: 1988年9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3 000册

书 号: ISBN 7-81009-157-3 / G · 028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编者的话

近年来，海内外出版了不少教育史料一类的著作、文献，然专门论及外语教育的却寥若晨星。这或许是出版界的一个疏漏。事实上，中国的近代教育发端于外语教育。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外语这门学科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且相当特殊的地位。收集整理外语教学史料对我国教育史的研究实在有很大的好处。为此，我们特邀请我国外语教育界一些著名的学者、教授、专家及有关人士撰写文稿，编成这本《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

《外语教育往事谈》是一部可靠的史料，它真实、朴素地记叙着近百年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概况。阅读这些记叙，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近当代中外语文教育的考察与分析。《外语教育往事谈》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学术论著，它汇集了学者、教授、专家们关于我国外语教育从方针、政策到教材、教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精辟阐述。《外语教育往事谈》又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回忆录，书中提到的人物、事件，时跨几乎一个世纪，地越亚洲、欧、美许多国家。至于内容，那更是包罗万象、饶有趣味，其中不乏首次披露的我国文化、教育界的奇闻轶事。作者们以本人的亲身经历，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充满生活气息的事例，或回忆自己从事外语教学的一生，或追记先辈、师长、同窗的往事，或描述某个时期、某个学校的外语教学实况。所有这一切给我们读者清晰地勾画出了一幅中国近当代外语教育的画卷。

“回忆过去实为 ego-trip 之一种方式，其乐无穷”，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先生赐寄本书题字时写给编者信中的一句

话。我们感谢这位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为本书亲笔题写书名,更感谢他用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妙语鼓励我们的工作。

收汇在这本集子中共有海内外三十位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如何编排文稿的篇目,对编者来说确是一个难题。多亏作者之中一位老教授出了一个好主意——按年龄大小为序。这不失为一个“老幼无欺”的高策,更是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的历史传统,我们原则上照此办理。

在为本书得以及时出版感到高兴之同时,我们又深感这是一本迟到了的回忆录。因为在组稿过程中,有几位曾答应为本书撰稿的教授于1986年4月至11月间先后与世长辞。他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凌达扬教授,南京大学陈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缪廷辅教授,广州外国语学院王多恩教授。另外,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漆竹生教授1987年4月修定文稿后,于同年6月在法国讲学期间不幸死于车祸。我国外语教育界老前辈、南京大学范存忠教授读完他本人文稿的一校后,于1987年12月谢世。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原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王佐良教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教授,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戴缙龄教授。正是他们三位教授在1986年初设计本书的最初阶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由于水平有限,我们的编辑工作中存有许多不足,甚至可能有失误之处。我们竭诚希望各位作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这绝不是每篇编者之话收尾时常用的客套话,因为我们还希望再邀请一批学者与专家(包括文学研究、翻译界的)撰写文稿,编辑本书的第二辑、第三辑。盼这个愿望能实现。

李良佑、刘 犁

谨识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1987年12月

目 录

| | | |
|---------------------------------|-----|--------|
| 我和外国语言····· | 季羨林 | (1) |
| 求学年代漫笔····· | 方 重 | (17) |
| 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 | 张威廉 | (32) |
| 学然后知不足····· | 范存忠 | (43) |
| 英语教学往事谈····· | 葛传槩 | (57) |
| 国难中长成的南开英文系····· | 柳无忌 | (72) |
| 英语教育五十五年····· | 黄嘉德 | (78) |
| 回忆我的母亲王季愚····· | 王力平 | (89) |
| 我与外语学习····· | 水天同 | (96) |
| 思往事,惜流芳····· | 朱 雯 | (106) |
| 六个教师和一个用低调子说话的人····· | 王宗炎 | (135) |
| 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 | 戴绶龄 | (145) |
| 学习外语和我的文学创作····· | 叶君健 | (151) |
| 外语教育的回忆片段····· | 吴景荣 | (173) |
| 往事、杂感和祝愿····· | 刘振瀛 | (179) |
| 回忆学生时代····· | 许国璋 | (188) |
| 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 杨周翰 | (199) |
| 在文华中学学英语····· | 王佐良 | (209) |
|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学习英语五十年····· | 周珏良 | (214) |
| 春满人间谈往事····· | 漆竹生 | (222) |
| 外语教学往事回忆····· | 陆佩弦 | (236) |
| 回忆我大学时代的几位老师····· | 李赋宁 | (256) |

艰苦创业育人才

- 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 付 克 (264)
- 我与外语…… 陈冠商 (283)
- 我与外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孟浩 (295)
- 回忆学习外语所走过的道路…… 梅绍武 (309)
- 应用语言学与我…… 桂诗春 (322)
- 外语学习甘苦谈…… 陈用仪 (343)
- 西语教学三十余年的回顾…… 岑楚兰 (356)
- 领进门的艺术
- 忆我的导师尼·谢·波斯彼洛夫教授 …… 王福祥 (365)

我和外国语言

季羨林

作者简介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同年赴德国就学于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先后兼任过系主任、副校长等职，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专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翻译作品《罗摩衍那》、《沙恭达罗》、《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家庭中的泰戈尔》等均已出版。

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时间好像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走过一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里，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to be 和 to have 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 verb（拉丁文 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英

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我报考小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一个“骤”字,被破格编入高小一年级。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入初小三年级。一个字给我争取了一年。现在又因为译出了这几句话,被编入春季始业的一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骤”字,或者我在小学没有学英文,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一年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生中偶然出现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不相信这一点是不行的。

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 的《拊掌录》(*Sketch Book*),好像还念过 Macaulay 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听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鸦片的习惯,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不见先生来临。班长不得不到他的住处去催请。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对这样一位老师是不大容易忘掉的。过了二十年以后,当我经过了高中、大学、教书、留学等等阶段,从欧洲回到济南时,我访问了我的母校,所有以前的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郑又桥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临大明湖的高楼上。我见到他,我们俩彼此都非常激动,这实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

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风景绝佳。可是这一位孤独的老人似乎并不能欣赏这绝妙的景色。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想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那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并不老实。来一个新教员，我们往往要试他一试，看他的本领如何。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少年心理吧。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测试”教员。有一年换了一位英文教员，我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于是在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 by the by。其实这也不是多么稀见的短语，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就拿去问老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脸上颇有愧色。我们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见到我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我们笑而不答。幸亏这一位老师颇为宽宏大量，以后他并没有对我们打击报复。

在这时候，我除了在学校里念英文外，还在每天晚上到尚实文学社去学习。校长叫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带广东腔的蓝青官话。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面一进院子是学社占用。后面的大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教我的老师除了冯老师以外，还有钮威如老师、陈鹤巢老师。钮老师满脸胡须，身体肥胖，用英文教我们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佳公子，衣饰华美。看来这几个老师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学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听到从后院传来的蟋蟀的鸣声。原来冯老师最喜欢养蟋蟀，山东人名之曰蚰蚰儿，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购买佳种。我自己当时也养蚰蚰，常常随同院里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蚰蚰，捉到了一只好的，则大喜若狂。我当然没有钱来买好的，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冯老师却肯花大钱，据说斗蚰蚰有时也下很大的赌注，不是随便玩玩的。

在这里用的英文教科书已经不能全部回忆出来。只有一本我忆念难忘，这就是 Nesfield 的文法，我们称之为《纳氏文法》，当时我觉得非常艰深，因而对它非常崇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英国人专门写了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样，这一

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像这样内容丰富的语法,我以后还没有见过。

尚实英文学社,我上了多久,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总有几年之久。学习的成绩我也说不出来,大概还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园白鹤庄去上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经名列榜首。当时教英文的教员共有三位,一位姓刘,名字忘了,只记得他的绰号,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这一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考试都交白卷,把他赶走了。我当时是班长,颇伤了一些脑筋。刘、尤两位老师却都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师生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

在北园高中,开始学了点德文。老师姓孙,名字忘记了。他长得宽额方脸,嘴上留着两撇像德皇威廉第二式的胡须,除了鼻子不够高以外,简直像是一个德国人。我们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书,实在很不像样子,他就用这个本子教我们。他是胶东口音,估计他在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一个德国什么洋行里干过活,学会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发音更为蹩脚。他把 gut 这个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时他满面怒容,说有人笑话他的发音。我心里想,那个人并没有错,然而孙老师却忿忿然。他德文虽不高明却颇为风雅,他自己出钱印过一册十七字诗,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只眼的人: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诸如此类,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民间蹩脚文人的创作,足证我们孙老师的欣赏水平并不怎样高。总之,我们似乎只念了一学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儿,并没有学

好,也不可能学好。

到了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一年。从1929年夏天起,我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据说是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实权却多次变换,有时候,仍然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起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来,多少有了一些新气象。《书经》、《诗经》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话文,从前是写古文的。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国文教员个个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因为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员却都记不清楚了。高中最后一年用的什么教本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格里弗游记》之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是几次英文作文。我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讲我们学校。我在作文中描绘了学校的大门外斜坡,大门内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后面图书馆所在的楼房。自己颇为得意,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我们的英文课一直用汉语进行,我们既不大能说,也不大能听。这是当时山东中学里一个普遍的缺点,同京、沪、津一些名牌中学比较起来,我们显然处于劣势。这大大地影响了考入名牌大学的命中率。

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我断断续续学习英语已经十年了,还学了一点德文。要问有什么经验没有呢?应该有一点,但并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过。以为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不认识的字了。我确实也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好多字实在太冷僻没有用处,于是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字典上查过的字都用红铅笔在字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字查过了。但是过了不久,又查到这个字。说明自己忘记了。这个办法有一点用处,它可以给我敲一下警钟:查过的字怎么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连查过几遍还是记不住,说明警钟也不大理想。现在的中学生要比我们当时聪明得多,他们恐怕不会来背字典了。阿门!加上阿弥陀佛!

不管怎么样,高中毕业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学。山东有一所山东大学,但是本省的学生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大愿意

报考本省的大学，一定要“进京赶考”。我们这一届高中有八十多个毕业生，几乎都到了北京。当年报考名牌大学，其困难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拿北大、清华来说，录取的学生恐怕不到报名的十分之一。据说有一个山东老乡报考北大、清华，考过四次，都名落孙山。我们考的那一年是第五次了，名次并不比孙山高。看榜后，神经顿时错乱，走到西山，昏迷漫游了四五天，才清醒过来，回到城里，从此回乡，再也不考大学了。

入学考试，英文是必须考的，以讲英语出名的清华，英文题出的并不难，只有一篇作文，题目忘记了。另外有一篇改错之类的东西。不以讲英语著名的北大出的题目却非常难，作文之外有一篇汉译英，题目是李后主的词：

别后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有的同学连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况译成英文！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文作文题也非常古怪，那一年的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样一个题目也很够一个中学毕业生做的。但是北大古怪之处还不在这里。各门学科考完之后，忽然宣布要加试英文听写(dictation)，这对我们实在是当头一棒。我们在中学没有听过英文。我大概由于单词记得多了一点，只要能听懂几个单词儿，就有办法了。记得老师念的是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只有一个字 *suffer*，我临阵惊慌，听懂了，但没有写对。其余大概都对了。考完之后，山东同学面带惊慌之色，奔走相告，几乎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知道，这一加试，录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很侥幸，北大、清华都录取了。当时处心积虑是想出国留洋。在这方面，清华比北大条件要好。我决定入清华西洋文学系。这一个系有一套详细的教学计划，课程有古希腊拉丁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评论、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教授有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

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但统统用英文讲授。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们中学没有听英文的练习。教大一英文的是美国小姐毕莲女士(Miss Bille)。头几堂课,我只听到她咽喉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声音,“剪不断”,理还乱,却一点也听不清单词。我在中学曾以英文自负,到了此时却落到这般地步,不啻当头一棒,悲观失望了好多天,幸而逐渐听出了个别的单词,仿佛能“剪断”了,大概不过用了几个礼拜,终于大体听懂了,算是度过了学英文的生平第一难关。

清华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英、德、法三种语言之一,从第一年X语,学到第四年X语者,谓之X语专门化(specialized in X)。实际上法语、德语完全不能同英语等量齐观。法语、德语都是从字母学起,教授都用英语讲授,而所谓第一年英语一开始就念 Jane Austin 的 *Pride and Prejudice*。其余所有的课也都用英语讲授。所以这三个专门化是十分不平等的。

我选的是德语专门化,就是说,学了四年德语。从表面上来看,四年得了八个 E(Excellent,最高分,清华分数是五级制),但实际上水平并不高。教第一年和第二年德语的是当时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震文)教授。他在德国学习多年,德文大概是好的,曾翻译了一些德国古典名著,比如席勒的《强盗》等等。他对学生也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是作为一个教员,他却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他教课从字母教起,教第一个字母 a 时,说:a 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初听之下,也还新鲜。但 b、c、d 等等,都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就窃窃私议了:“我们不管它是否是丹田里的几口气。我们只想把音发得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就传为笑谈。

杨老师家庭生活也非常有趣。他是北京大学的系主任,工资相当高,推算起来,可能有现在教授的十几倍。不过在北洋军阀时期,常常拖欠工资,国民党统治前期,稍微好一点,到了后期,什么法币、什么银元券、什么金元券一来,钞票几乎等于手纸,教授们的生活就够呛了。杨老师据说兼五个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达上

千元银元。我在大学念书时,每月饭费只需六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可见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他在北大沙滩附近有一处大房子,服务人员有一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看戏捧戏子,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个非常离奇的结合。杨老师的人生观也很离奇,他信一些奇怪的东西,更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把他的人生哲学应用到教学上就是极端不负责任,游戏人间,逢场作戏而已。他打分数,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我们一交卷,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在卷子上。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同学,因为脾气粘粘糊糊,交了卷,站着不走。杨老师说:“你嫌少吗?”立即把 S(superior, 第二级)改为 E。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德语的。高中时期孙老师教的那一点德语早已交还了老师,杨老师又是这样来教,可见我的德语基础是很脆弱的。第二年仍然由他来教,前两年可以说是轻松愉快,但不踏实。

第三年是石坦安先生(von den Steinen, 德国人)教,他比较认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这年学了不少的东西。第四年换了艾克(G. Ecke, 号锷风, 德国人)。他又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先生。他工资很高,又独自一人,在城里租了一座王府居住。他自己住在银安殿上,仆从则住在前面一个大院子里。他搜集了不少的中国古代名画。他在德国学的是艺术史,因此对艺术很有兴趣,也懂行。他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鲁迅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他。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但是作为一个德语教员,则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教员。他对教书心不在焉。他平常用英文讲授,有一次我们曾请求他用德语讲,他立刻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其快如悬河泻水,最后用德语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我们摇摇头,想说:“Wir verstehen nichts davon.”但说不出来,只好还说英语。他说道:“既然你们听不懂,我还是用英语讲吧!”我们虽不同意,然而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课程就照旧进行下去了。

但是他对我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最喜欢 Hölderlin 和 Plateno。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喜欢起 Hölderlin 来。我的学士论文: *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 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他是指导教授。当时我大概对 Hölderlin 不会了解得太多,太深。论文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恐怕是非常肤浅的。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有一次写了几篇文章,拿了点稿费,特别向德国订购了 Hölderlin 的豪华本的全集,此书我珍藏至今,念了一些,但不甚了了。

除了英文和德文外,我还选了法文。教员是德国小姐 *Mademoiselle Holland*, 中文名叫华兰德。当时她已发白如雪,大概很有一把子年纪了。因为是独身,性情有些反常,有点乖戾,要用医学术语来说,她恐怕患了迫害狂。在课堂上专以骂人为乐。如果学生的答卷非常完美,她挑不出毛病来借端骂人,她的火气就更大,简直要勃然大怒。最初选课的人很多,过了没有多久,就被她骂走了一多半。只剩下我们几个不怕骂的仍然留下,其中有华罗庚同志。有一次把我们骂得实在火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对她予以反击,结果大出意料,她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特意邀请我们到她的住处(现在北大南门外的军机处)去吃了一顿饭。可见师徒间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揖让进退,海宇澄清了。

我还旁听过俄文课。教员是一个白俄,名字好像是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我只听到讲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我旁听的兴趣越来越低,终于不再听了。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我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我上面谈到,我虽然号称德文专门化,然而学习并不好。可是我偏偏得了四年高分。当我 1934 年毕业后,不得已而回到母校济南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订立了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我报名应考,结果被录取了。我当年舍北大而

趋清华的如意算盘终于真正实现了,我能到德国去留学了。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可是我的德文水平不高,我看书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听、说则全无训练。到了德国,吃了德国面包,也无法立刻改变。我到德国学术交流处去报到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含笑对我说:“Lange Reise!”(长途旅行呀!)我愣里愣怔,竟没有听懂。我留在柏林,天天到柏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为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去学习了六周,到了深秋时分,我被分配到 Göttingen(哥廷根)大学去学习。我对于这个在世界上颇为著名的大学什么都不清楚。第一学期,我还没有能决定究竟学习哪一个学科。我随便选了一些课,因为交换研究生选课不用付钱,所以我尽量多选,我每天要听课六七小时。选的课我不一定都有兴趣,我也不能全部听懂。我的目的其实是通过选课听课提高自己的听的能力。我当时听德语的水平非常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解放后,我们的外语教育,不管还有多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其水平和认真的态度是解放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这一点现在的青年不一定都清楚。因此我在这里说上几句。

我还利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高自已的听说能力,这就是同我的女房东谈话。德国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住宿的问题学校根本不管,学生都住民房。我的女房东有一些文化水平,但不高。她喜欢说话,唠唠叨叨,每天晚上到我屋里来收拾床铺,她都要说上一大套,把一天的经过都说一遍。别人大概都不爱听,我却是求之不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练习听力。我的女房东可以说是一位很好的德文教员,可惜我既不付报酬,她自己也不知道讨报酬,她成了我的义务教员。

到了第二学期,我偶然看到 Prof. Waldschmidt 开梵文课的告示。我大喜过望,立刻选了这一门课。我在清华大学时,曾经想学梵文,但没有老师教,只好作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怎能放过呢?学生只有三个: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个历史系的学